

家庭与儿童的政治认知研究

季乃礼¹,李志亮¹,王 焱²

(1.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2.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天津 300071)

摘要:家庭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构,但是国内学术界对此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家庭对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家庭对儿童的政治认知至关重要。通过天津、重庆两地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家庭的经济状况、母亲的职业、亲子关系的密切程度、家庭的教养模式等等都对儿童的政治认知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重视学校教育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家庭教育。

关键词:家庭;儿童;政治认知;领导人认同

中图分类号: D 691.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13)04-0069-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政治社会化的各个机构中,家庭、学校、大众传媒和同辈群体是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而这种四种机构中,家庭对政治有效性的影响最大^[1]。家庭之所以在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中最有影响,是由家庭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家庭是儿童一出生首先接触的社会化机构。海曼(Herbert H. Hyman)说:“影响政治的最初的社会化机构是家庭。”^[2]由于家庭儿童所首先接触的社会化机构,这时儿童对社会的认知和政治知识都处于一片空白,父母对子女的政治教育具有“先入为主”的效应。其次,家庭教育的垄断性。儿童在出生的最初几年中,所接受的政治知识几乎都是从家庭中获得的,换言之家庭在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处于垄断地位。再次,家庭的情感纽带。道森和普罗维特认为,很少人际关系像亲子关系这样强烈和有深度,没有其他机构在儿童的早期在此方面与之匹敌^[3]。最后,家庭的血缘性。家庭能够在政治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在于亲子间的血缘纽带,这种优势是其他的社

会机构如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所无法具有。

一般说来,家庭传递政治文化的形式有4种:

一是直接的灌输,父母向子女直接传输他们所理解的政治文化。在家庭中,父母会把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态度直接灌输给子女。以美国为例,一些政治态度的获得即是来自于父母的直接教授。譬如忠诚的情感,对政府象征(国旗、自由女神)的尊重,一个公民被期盼的行为(尤其是守法)。而且,家庭也传递不同的观点,如对某个发生事件采取的态度^[4]。

二是榜样的认同,父母没有明确向子女灌输政治文化,但父母的言传身教也会间接地影响着子女。父母提供了可供儿童模仿的榜样,儿童多对自己的父母的政治观点认同。戴维斯(James C. Davis)认为“父亲是政治人物的原型,由此开启了儿童的政治权威的看法。”^[5]

三是家庭的社会环境。每个人的出生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社会背景的设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父母的社会地位、父母所受的教育、所居住的地区等都都对子女的政治态度有着明显的影响。对于儿童来说,家庭往往是环境影响的中介。海曼(Herbert H. Hyman)认为对事件的解释需要成年人

收稿日期 2013-04-06

基金项目 南开大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过程中儿童的政治社会化研究”(12045)

作者简介 季乃礼(1970—),男,山东高青人,博士,南开大学教授,从事中外政治学说和政治心理研究;李志亮(1987—),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生,从事政治心理学研究;王焱(1974—),男,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从事政治心理学研究

的介入,这样就减少了儿童直接面对现实。通常情况下,父母构建了儿童的世界观。父母的介入成为弱化社会变迁的因素。年幼儿童几乎与大的环境绝缘,他们不关注经济和经济的条件。譬如失业家庭的孩子,没有证据显示失业对政治态度的影响。而大学生之前的学生更容易变化,也在于他们这时已经脱离了家庭^[6]。

四是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也会影响着将来走向社会时如何与人相处,如何理解政治和社会。麦科比(Maccoby)发现一个父母对子女控制越严格,孩子越有反叛的冲动。相反,对待子女既不是采取自由放任也不是采取威权主义的方式对待孩子,采取说服而不是命令的强制方式,这种情况下亲子间的政治价值最有可能一致^[7]。

总之,家庭在儿童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是独特的,同时家庭对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国内学术界对家庭在儿童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现在并没有学者对此进行相关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 2011 年 5 月和 9 月分别对重庆和天津地区近 1200 份中小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问卷调查得出结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限于儿童的政治认知方面,即探讨家庭因素对儿童的政治认知的影响。

本文根据儿童的认知能力把研究范围锁定在小学三年级学生至初中二年级学生,按年龄来说大概在 8 岁至 14 岁之间。之所以作出以上选择,一是根据学术界公认的标准。综合各家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年龄阶段:0 至 13 岁、14 至 17 岁、18 至 24 岁、25 至 34 岁、35 至 64 岁、65 岁以上。其中,0 至 13 岁属于童年时期;14 至 17 岁属于中学时期,这段时期学术界也通常称之为青少年时期或青春期;18 岁以后属于成年时期。二是与我国的国情有关。少年儿童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我国儿童成长过程中参加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同时也是儿童参加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在我国少年儿童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少先队的成员年龄是 6 至 14 岁的少年儿童,而超过 14 周岁就自动退队。一般来讲,超过 14 岁的就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青团,而初二学生大多在 14 岁左右,因此,本文将调查对象的年级的上限设定为初中二年级。而调查对象的年级下线是小学三年级,这是因为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识字能力,这

样就能保证问卷的统一性。如果是一二年级的儿童,问卷需要大量的图片说明来测量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这不仅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也可能造成测量中的误差。

2011 年的 5 月和 9 月,我们在重庆和天津选取了小学和初中各一所,一共四所进行了问卷发放。这四所学校位于市区,属于各市的区重点。本次问卷共发出 1200 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 1092 份,问卷回收率 91%。其中,重庆地区回收有效问卷 612 份,天津地区回收有效问卷 480 份。

在有效回收的 1092 份问卷中,男生 554 份,占样本总量的 50.7%;女生 538 份,占样本总量的 49.3%。

你的性别

	样本量	比例(%)
男生	554	50.7%
女生	538	49.3%
合计	1092	100.0%

在有效回收的 1092 份问卷中,各年级的样本量如下图所示。

你的年级

年级	样本量	比例(%)
小学三年级	170	15.6%
小学四年级	181	16.6%
小学五年级	185	16.9%
小学六年级	179	16.4%
初中一年级	185	16.9%
初中二年级	192	17.6%
合计	1092	100.0%

二、问卷设计的变量与说明

自变量涉及到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父母的教育程度、职业、家庭的富裕程度、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家庭的培养方式。考察以下变量对政治认知、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的影响。

(一)父母职业的操作测量

父母职业的不同,儿童的政治社会化成效可能不同。这一假设得到了前人的验证。本研究试图对此作出假设及检验。但是,考虑到问卷的简洁性以及施测对象的理解能力。本文对于父母的职业这一项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分类。

具体操作方法是,根据 2004 年国务院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

方案》的分类^[8],将单位性质分为六类:军队、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六类。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军队和政府机关都属于党领导下的组织机构。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同,我国实行的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同样,我国的各级政府都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政府公务员需要接受党的领导。党具体通过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三种方式对军队和政府进行领导。军队和政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国家权力机关,它们服从党的指挥、执行党的意志。因此,本文在设计问卷中将军队列入到广义的“机关单位”中。而在一般政治学理论中,广义的“政府机关”还包括司法部门如法院等。本研究在题目设置中设父母工作地点选项中的“机关单位”包含有“军队、法院”等。其次,我们把社会团体也合并到“事业单位”的选项中。这是因为,首先,这两类组织在目的上具有相似性,他们既不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也不属于直接处理政治事务的权力组织机构。但是,这两类组织都有一定的相似处,如都有一定的直接对口的业务主管部门,同时在这些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政府的财政拨款,在其组织的工作人员也拥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等。这个分类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虽然这些组织有着一定的独立地位,但依然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控制^[9]。

因此我们并没有询问父母的详细职业,而是将父母的职业做了一个大的归类。在题目中以询问“父母在哪里工作”代替了传统的“父母的职业”^①。

(二)家庭经济地位的操作测量

在前人的研究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政治社会化成效有显著影响。我们考虑到大部分儿童不一定了解父母的收入状况这一客观事实。将常见的询问“家庭收入”这一客观实际问题转换成“你认为你的家里的经济状况如何”这一主观认知题。答案选项设为“很富裕”“比较富裕”“一般”“比较差”“很差”五个。

(三)家庭结构的操作测量

家庭结构指的是家庭组成的类型及各成员相互间的关系。最常见的家庭分类是以家庭代际层次和亲属关系为标准的,包括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和其他家庭等四种类型。本研究问卷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设计,常见的模式有核心家庭,即父母与儿童一起居住。在此次研究中这样的样本有644份;还

有我国三世同堂的传统家庭模式,虽然现在家庭呈现出小型化的趋势,但是这样的样本数依然有260份;有的儿童,父母因为各种原因不在身边,只能由父亲或母亲的双亲照顾生活,这样的样本有34份;还有的与父亲或母亲单独居住的,这种单亲家庭的样本有91份;除此之外,还有某些儿童与非直系亲属一块儿居住的,这样的家庭在社会中并不普遍,但在我们的样本中,还有22份^②。

(四)家庭权威模式与亲子关系的操作测量

家庭权威模式由四道题组成^③。将这四道题进行加权,得出一个家庭权威模式的分数。分数越低,代表父母的管教方式更加专制和严苛。

父母儿童间的亲子关系由两道题组成^④。这两道题的得分进行加权,得到一个亲子关系的得分,得分越低说明亲子关系越密切。

三、家庭环境因素对儿童的政治认知的影响分析

(一)政治认知的量表设计

“认知”(cognition)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所谓社会认知,Fiske and Taylor(1984)将其解释为“人们如何理解他者和自己,聚焦于普通人如何思考人。”^[10]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信息如何组织和储存在记忆中?二是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如何影响新信息的处理和解释,以及其后的判断、决策和行为?三是新的信息、反映和其他过程如何引起心理表征的变化。政治认知是认知的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政治认知主要关注对政治信念的梳理形成的记忆结构,政治信息的处理,人们面对政治信息时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最终的决策和判断^[11]。简言之,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有关政治现象的知识,以及对政治的理解和判断。

我们采用的是伊斯顿与海斯1960年考查芝加哥市郊的白人中产阶级儿童的问题^[12],这些条目主要涉及儿童对领导人的认同方面:相比于大多数人,国家领导人工作更辛苦;相比于大多数人,国家领导人更正直,更值得相信;相比于大多数人,国家领导人拥有更多的知识。选项采用里克特五分点量表,即“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好说、同意、非常同意”从1分至5分依次赋值。

(二) 结果的分析

分别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为因子, 分析其对儿童的领导人认知的影响。见

表 1 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与儿童的领导人认知

	领导人认知
父亲受教育程度	0.232**
母亲受教育程度	0.719
父亲职业为因子	0.623
母亲职业为因子	0.047

** $p < 0.05$

* 号表示显著性系数的大小, 一般是 *** 显著性小于 0.01, ** 显著性小于 0.05。

通过该表 1, 可以发现, 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对于儿童的政治认知没有显著影响。而母亲的职业对儿童的政治认知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 母亲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儿童对领导人的政治认知最高, 其次为母亲在企业工作的儿童, 而母亲在政府机构工作、或在家庭工作或没有工作的儿童的政治认知都非常低。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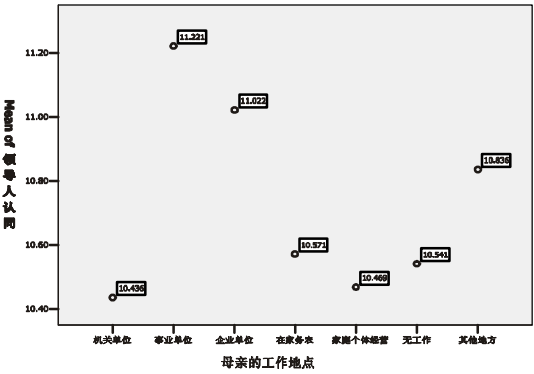


图 1 母亲的工作地点与领导人认知的关系

以家庭富裕程度的主观认知为因子, 其对儿童的情感认知的差异显著性系数为 0.00 小于 0.05, 即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儿童的领导人情感认知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 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家庭的儿童的政治情感要比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儿童的认知程度高。在我们样本中发现, 那些认为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很差的儿童, 其对政治领导人的情感最为消极。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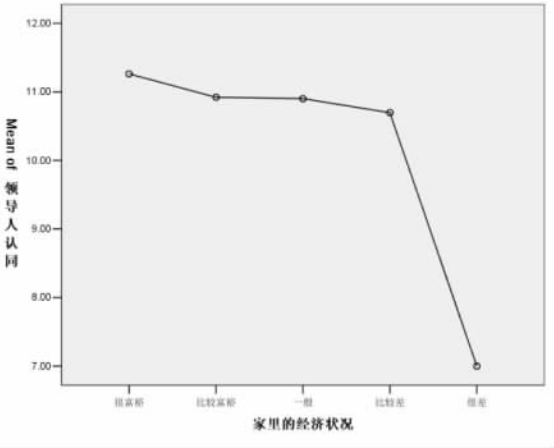


图 2 家里的经济状况与领导人认知之间的关系

以家庭结构为因子, 发现其对儿童的政治认知影响的显著性系数为 0.055, 近似于 0.05, 我们可以认为家庭结构对儿童的政治认知差异有显著影响。我们发现, 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居住的分值最高, 但涉及到的样本仅有 36 份, 而与亲戚一起居住的也仅有 23 份, 样本量明显存在不足。因此与父母亲一起居住的以及的政治认知最高, 而父母有一方不在身边的儿童的政治认知是最低的。

以亲子关系为分析因子, 发现其对儿童的领导人情感认知影响的显著性系数为 0.00 小于 0.05。家庭的亲子关系越好越亲密, 儿童的政治领导人认知越高。

家庭权威模式中, 分数越低, 表示父母的管教方式越加专制和严苛; 分数越高, 父母的管教方式越加民主和宽容。

以家庭权威模式为因子, 发现其对儿童的领导人情感认知的显著性系数为 0.01, 即家庭的权威模式对儿童的领导人情感认知有显著影响。父母以专制权威方式教育儿童的家庭, 儿童的情感认知偏低; 而父母以民主方式教育儿童的家庭, 儿童的情感认知偏高。

(三) 讨论与结论

我们对以上结论的探讨, 主要将研究的结论与中西两个维度进行比较, 以此凸显当今家庭与政治的关系。

家庭对儿童的政治认知的影响至关重要。家庭的经济地位越高, 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越长, 关系越亲密, 培养方式越民主, 儿童的政治认知程度就越高。这些结果基本与西方学术界研究得到的结论基

本一致。因此,要提高儿童的政治认知,必须重视家庭的思想政治教育。家庭的教育不同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多不是直接的灌输,而是一些无形的影响。相对于西方的论著,本文又有新的发现:

其一,母亲的政府部门工作的身份对儿童的政治认知最低,而母亲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最高,其次是企业。对此的认知我们可以结合经济条件来理解,一般来说,父母在政府、事业单位的,经济地位较高;企业除非是大型国有企业或外企,经济地位相对来说不高。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经济地位高者,政治认知程度越高。因此,母亲在事业单位工作,比在企业工作的,儿童的政治认知高也就不难理解了。母亲在政府部门工作,政治认知度低,说明职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经济地位的影响。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点解释此现象:一般来说,一是男主外女主内,决定了家庭中母亲与子女接触的时间,比父亲要长,从母亲那里接触到的政治信息远多于父亲,因此,母亲的职业对子女的影响往往大于父亲。二是父母作为外界政治信息的过滤器,怕伤及子女的心理成长,会把负面的信息过滤出去,把好的传输给子女。因此,儿童对政治认知普遍较高。我们在调查中也验证了这一点。但是,母亲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所接触的政治信息较多,在向子女传输的过程中,过滤的难度加大,子女接触负面的政治信息的机会增多,从而影响他们的政治认知。三是父母的榜样力量对子女的政治认知也会有影响。由于母亲的政府部门身份,子女或多或少会以自己的父母,尤其是自己的母亲作为政治认知的对象来评估,理想的评估会削弱,相反现实的评估增加,从而导致政治认知的下降。

其二,父母与子女相处时间的长短,影响着子女的政治认知。与父母长期不在一起居住,不但影响着他们的心理、生理的成长,也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认知。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这种情况呈现加剧之势。农民工进城打工,把子女留在农村;或子女虽然与他们一起进城,但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子女;城市中的父母工作在一地,居住在另一地的现象也会逐渐增多,使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路上和工作中,与子女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以上这些都会对影响子女对父母的印象,也直接影响到政治认知的水平。

与中国传统相比,我们也会发现当今家庭与政治关系的一些特征。孔子认为凡能对父孝者必定能对君忠,“孝慈则忠”,也就是说凡是服从于父权的人自然也会顺从于君权。在孔子那里,“出则事公卿,入

则事父兄”,对此他的学生有子说的更为明确: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继孔子之后,孟子把修身、事亲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孟子·离娄上》)。人只要事其亲即“孝悌”,也就抓住了事的根本,以此来治理天下,就能达到天下大治。从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不难看出,他们把家庭的修养作为统治的根本,只有家庭稳定,社会才能稳定。这点从我们的调查中,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与父母关系密切、与父母相处时间长的,对领导人的认同度较高。但与之不同的是,家庭教养模式与领导人认同之间的关系。传统社会中,威权式的教养模式,即要求子女对父母一定要孝谨,与对君主忠诚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专制的性质所决定的,家庭中父亲的专制与政治领域中的君主专制相对应。而在当今社会中,随着民主潮流的发展,民主的文化已经渗透到家庭和政治领域中,民主的教养模式与对领导人的认同呈正比关系,相反威权式的教养模式却导致对领导人认同的下降。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中,经济建设是一切发展的中心,社会的稳定压倒一切,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但要维持社会稳定,我们必须关注到家庭的重要作用。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的培养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长久。由家庭对儿童的政治认知的影响,我们要认识到,必须对儿童的教育从小、从早抓起,父母在此过程中要做出榜样,对子女要宽容,以民主的方式对待子女;父母要尽量多与子女相触,加强情感的交流。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提高家庭的经济地位也是培养儿童的政治认知的重要方面。而要做到以上这些方面,首先需要父母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做出贡献,譬如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家庭的生活,尤其是贫困家庭,创造父母与子女相触的各种机会,出台各种法规规范亲子关系等等。

注:

- ① 你父母在哪里工作?(1)机关单位(政府部门、法院、部队等);(2)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3)企业单位(公司、工厂、事务所等);(4)家庭个体经营;(5)无工作;(6)不清楚
- ② 你目前与谁一起居住?(1)与父母一起居住;(2)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父母亲一起居住;(3)与父亲或母亲单独居

住;(4)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居住(5)与亲戚一起居住(父母不在身边)

- ③ 共四道题:家里的事情,父母会征询我的看法,再一起做决定;父母会强迫我去做一些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如果我的成绩不好,父母会鼓励我,不会处罚我;大致来说,父母对我的管教方式是。选项按照里克特五分量表进行设计,分为几乎不会、很少、有时、经常、总是。
- ④ 共 2 道题:我若有心事,无论是哪些方面的,都会告诉父母;父母会专门抽出时间来和我聊天或就某些事进行讨论。选项设计按照里克特五分量表,分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几乎不会。为了防止学生答题时的随意性,此处分值的设置与教养模式分数的计算相反,分数越低代表亲子关系越亲密。

参考文献:

- [1] Kenneth P.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155-156.
- [2] Herbert H. Hym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p51.
- [3] Richard Dawson and Kenneth Prewit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107-108.
- [4] Kenneth P.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p.23.

- [5] James C. Davis. The Family's Role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1965,pp.10,12.
- [6] Herbert H. Hym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p99-104.
- [7] Eleanor E. Maccoby, Richard E. Matthews and Anton S. Morton. The Family and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Youth [M]. p193-194.
- [8]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EB/OL].http://www.stats.gov.cn/zgjpc/pcfa/t20041101_402204469.htm
- [9]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开放时代,2008,(2).
- [10] S. T. Fiske & S.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M]. New York: McGraw-Hill, 1984, p.1.
- [11] Kathleen M. McGraw, Contributions of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Political Psychology[J].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1, No.4, 2000, pp. 805-832.
- [12] Robert D. Hess and David Easton. The Child's Changing Image of the President [J].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24, No.4, 1960, pp.636-637.

【责任编辑:张西山】

Family and Children's Political Cognition

Ji Nai-li¹, Li Zhi-liang¹, WANG Yan²

(1. Nankai University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Tianjin 300071; 2.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Jurisprudence,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ar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However, as such they are understudied in China's academia. Families exert multiple influences on a society's political scene, and its impact on children's political cognition is enormous. Surveys done in Tianjin and Chongqing on children reveal that a family's socio-economic status, mothers' professional occupation, child-parent intimacy and families' educational approach, etc., significantly impact a child's political cognition. We therefore must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alongside 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 family; children; political cognition; identification with political leaders